

## 抗战文史编辑[辑]1—40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 lawrence 发布时间: 2011-8-29 15:04:22 阅读: 次

### 松冈洋右与重庆的和平工作

浜口裕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以后，日本与中国进入战争状态。7月19日，蒋介石发表“最后的关头”声明指出：“全体国民进入抗战”。9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

1939年3月，松冈洋右辞去“满铁”总裁的职务，就任第二届近卫文磨的内阁。松冈洋右提出：成立日本、德国、意大利的三国联盟，与美国、英国来共同对峙中国的和平。1939年9月，三国联盟结成。中国方面，以交通银行董事长、国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钱永铭为代表，提出三个条件：一是重庆的国民政府与南京的汪精卫政府合并，成立新的中国统一政府；二是日本军队从中国全部撤退；三是日本政府与新的中国统一政府签订共同防守条约。关于重庆和平问题，由于日本国内各部门之间、陆军与外务省之间，产生了分歧。

1939年11月，南京政府正式承认“关于重庆的和平不可能”。日本认为，南京政府要承认重庆国民政府和日本承认汪精卫政府，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日本还认为“中国已经下决心，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 成吉思汗的祭示与中日战争的概要

田中刚

抗战时期，内蒙古的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和蒙疆政权、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以及各种势力，纷纷进行成吉思汗祭示。这种现象被称为“成吉思汗热”现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为了保护蒙古祭示的公主和八白宫，把成吉思汗祭示场地，迁移到甘肃。国民政府把成吉思汗祭示称为“国家的祭示”。而延安的共产党称为“传统的文化”。

这种“成吉思汗热”现象，可以解释为继承传统的现象，而成吉思汗的家族，把成吉思汗祭示称为“国家祭示”，并逐渐大众化起来。

### 抗战时期的都市文艺人和塞外边陲 ——抗战电影《塞上风云》

岛田美和

日中战争（1937-45年）时期，汉族的左派都市文艺人创作了抗战文艺作品《塞上风云》，本稿对该作品的改编过程进行了考察，通过考察，清楚地了解了抗战时期的都市文艺人和“边疆”地区文艺人的文化接触现状，以及抗战时期，在西北地区的开发过程中，文艺所发挥的作用，明确了汉族都市文艺人的“少数民族”观和“边疆”观等的变化过程。

《塞上风云》是一部由上海左派文艺人阳翰笙，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在上海创作的电影剧本。讲的是汉族人民和蒙古族人民一起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故事。该剧本于1938年首先在武汉被搬上舞台。电影版的《塞上风云》于1940年在内蒙古开始拍摄，经过一段时间的制作和国民政府的审查，终于于1942年公映。作品的舞台是伊克昭盟。伊克昭盟与当时的日本傀儡政权——伪蒙疆政权相邻，位于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地区。日中战争时期，伊克昭盟内蒙古族地区由统辖其南面陕西省榆林的国民党军事势力所管辖。在他们看来，抗日战争时期对蒙古族的工作是对日军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当地的文艺人也提倡汉族和蒙古族合作。

在上海发展的抗战文艺，受国防文艺的潮流的影响，采取了基于历史事实的手法进行剧本的创作。因此，在戏剧剧本和舞台版的《塞上风云》里，汉族和蒙古族自清末以来一直对立的场面也被忠实地描写了出来。

但是，在以蒙古族为观众的榆林地区，在对少数民族进行抗战指导的过程中，《塞上风云》里汉族和蒙古族的对立场面，却孕育着阻碍蒙古族和汉族加强团结的危险。为了克服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对立，接受国民政府审查的电影版《塞上风云》，就影片中现出的都市文艺人对边疆存在片面认识的部分，即汉族和蒙古族的对立部分进行了更改。

另一方面，在榆林，“边疆”文艺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个是《塞上风云》和榆林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主管杨令德提倡的，作为抗战文艺的“边疆”文艺。另一个是榆林的中国边疆学会理事马鹤天提倡的，以开发西北为目的的“边疆文艺”。杨令德始终坚持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目的的“边疆”文艺。另一方，马鹤天却坚持把“边疆”文艺看作是包括汉族在内的西北地区开发事业的一部分，而对蒙古族固有文化有忽视的倾向。

### 抗日战争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对中国之军事外交政策

权宁俊

本文的研究课题是试图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下简称临政）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中探明抗日战争爆发到日本战败期间临政的军事

外交政策。

1919年“三一独立运动”爆发之后，临政长时间以上海为据点开展反日独立运动。而其军事活动性质，以抗日战争爆发为界，性质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是由在中国东北地方的北路军政署、西路军政署、大韩民国、重光团等韩国独立军部的军事组织开展抗日活动。当时临政还没有自己固有的军事组织。与这些军事组织也并无直接关系。抗日战争爆发后，临政决定组成自己的军事组织，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和军事活动经验，因此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以下简称国民政府）及国民党。而且，可以说当时是在国民政府强大的指导和庇护下，接受着不能提出自己意见的“指导”，开展起军事活动。例如，1940年5月，临政向国民政府提出了《韩国独立军编练计划大纲》，中国方面对此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之后，同意其成立韩国光复军（以下简称光复军）。1940年9月15日，光复军在重庆正式成立，这是临政开展其军事外交政策取得的最大成果。

而本文将主要针对临政对中国军事外交政策的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研究。首先，从光复军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中搞清楚在其建军之前临政与国民政府的军事交涉过程；第二，探讨朝鲜义勇队被编入光复军之前的活动和历程；第三，围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事委员会）提案的《韩国光复军行动准绳九条》，对国民政府与临政之间对立、交涉、妥协的过程进行考察；最后，对有关光复军的编制和活动问题进行探讨。

本文主要从临政对国民政府及国民党的军事外交政策和与其的合作以及指导与被指导关系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归纳总结上述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抗战时期临政通过其军事外交方面的努力，实现了以下几个目标。第一，经过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承认实现了光复军的建军。而且，中国方面在其建军时为其派遣了韩国籍的现役中国军官，在其建军后为其提供了生活费、活动经费等财政方面的援助。第二，受到中国国内政局的影响（新四军皖南事件导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遭到破坏），韩国人的另一个军事组织朝鲜义勇队在1941年3月中旬至5月下旬期间产生分裂。分裂产生之后，由临政方面勉强维持着义勇队的残余部队，在1942年5月，军事委员会下令将其编入光复军。第三，1941年11月，军事委员会提出了让韩国军很难接受的《韩国光复军行动准绳九条》，临政对此提出了强烈修正要求，并与国民政府进行了长期的交涉，最终取得了胜利，通过了《援助韩国光复军办法》。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在重大局势上中国对临政的军事外交政策给予了配合、支援和指导。当然，在此事实上也需承认临政成员为争取自由和独立所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斗争。

## 论抗战时期大后方小说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以《抗战文艺》为中心

何 瑶

中国抗战文学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辉煌的一页。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是中国抗战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抗战文学的特殊风貌的典型代表。过去对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大多是概览式的研究，或是名家名篇个体观照，鲜有从贯穿整个抗战时期的文学期刊入手进行纵向的整体研究。

我们认为可以从《抗战文艺》上的小说这种体裁入手，从期刊文学的角度，立足于文学研究本身，对《抗战文艺》上的小说文本进行收集、整理与研究。通过深入地细读文本，纵向整体地考察，从文学的角度确立《抗战文艺》上小说的实际分期，理清抗战时期大后方小说的发展脉络，着力复现大后方小说发展的原生态图景，从而更准确地揭示抗战时期大后方小说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为抗战文学研究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长期以来不少论者对抗战时期大后方小说有政治功利性突出，概念化、公式化严重，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的评价。这主要是因为缺乏具体文本研究与系统全面的考察，是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认识。抑或由于过去的文本被遮蔽了，一些作品没有机会与人们见面，局限了人们的阅读视野，影响了人们的认识判断。我们试图在论文中尽量使用过去较少与读者见面的作品来分析论述，对《抗战文艺》做系统地梳理研究，在对抗战小说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把握中，来复现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的真实面貌。

在论文中我们将突破以往三个阶段的划分方法，采取两个阶段的划分方法，将《抗战文艺》上的小说以第七卷第六期（即，1942年6月15日）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来研究。

### 一、抗战前期大后方小说发展的文学特征

本时期，战争像决堤的洪水汹涌而至，打破了人们往昔的宁静，人们的生活因战争而发生剧变。人们每天关心、谈论的都是战局、战争，战争俨然成为人们生活的主导面，与人们的生活朝夕相关、紧密相连，整个社会生活的重心均以抗战为依托。随着局势的步步紧逼，战事在艰难中挺进，战争生活形影相随，笼罩着这个时期，“欢笑和眼泪都‘与抗战有关’，吃饭，恋爱和住房子也都‘与抗战有关’。”作家在此时“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所写的文字，都与抗战有关，是当然的事。”他们“但凡有所作，总向着一个方向，也为也只有有一个方向。”我们对《抗战文艺》上前期的小说做了细致地梳理，进行了整体考察，发现战争生活是本时期小说叙事的中心。在对战争生活进行观照时，作家主要是从战争中（即：与战争直接相关）来展示。作家不仅看重胜利光明的一面，也揭发现实里直接影响抗战的污秽和黑暗。《抗战文艺》上发表的小说正是兼顾着抗战中的光明面和黑暗面，对战争生活作立体的真实的反映，既注重战争场面的展现，也不忽略后方阴暗面。因此，这一时期的抗战小说大都围绕战争生活而展开，以抗日救亡为总的主题，从战争场面和后方阴暗面两个方向入手，践行真实性的创作原则，追求新闻性与纪实性的艺术表现，在战争生活这个范畴内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呈现出单一化的文学特征。

在这一部分，首先，我们对这一时期小说反映的主要内容战时生活的真实描绘进行论述。其次，我们分别从以“抗日救亡”占主导地位的主题，以英雄形象与阴暗形象为主的人物形象及大众化的艺术表达三个方面谁制高点前期大后方小说单一中显现丰富的文学特征。

### 二、抗战后期大后方小说发展的文学特征

抗战后期，虽然抗战胜利的曙光在召唤，必胜的基础已奠定，但抗战的长期性与艰苦性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须要刻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地方还多得很，民族本身的弱点，须要克服的，也还多得很；这又应该是贯串在一切小说中的一个主要的指标。而这一点，又必须避免标语口号，要从日常的政治社会的生活中综合概括出典型的事象而加以有力的描写。”因此，“文艺工作者比任何人还知道得清楚：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准，改造全民族性格习俗，这是比疆场上的战争更艰巨，更需要长期努力的斗争。”而“文艺通常被比作武器，环境越不好，武器越不宜放手，越要把他磨得锋快。”此时，战争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为人们所熟悉，随着大规模的反攻行动逐渐展开，战场上也捷报频传，作家们逐渐摆脱了抗战前期“只有随时的心灵火花的爆发，还没有工夫去堆积柴来，从容的燃起冲天的烽火”的写作状态。靠着中华全国文艺界同仁的努力，抗战小说的创作在本时期繁荣起来，有了长足进展。作家们开始冷静地思考这场战争，反观抗战的现实，关注的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战争本身，视域的重心逐渐向战时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转移，更加关注抗战中所反映出的现实问题。

本时期，《抗战文艺》上的小说将视线较多集中到与战时生活相关的日常生活上，展示战时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为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重点。作家把抗战多年来体验到的生活作深入的反映与表现，“把与抗战有关的关系扩大了”，抗战题材的范围也得到了相应的扩展。考察《抗战文艺》上的小说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既有写现代题材的，比如，文若的《烦恼》；也有写古代题材的，比如，徐盈的《禹》通过鲧和禹在治水过程中的不同处事态度的比较，借古喻今，表达团结抗战的愿望；既有写中国题材的，比如，姚雪垠的《夏光明》反映了抗战爆发后的青年运动，表现了民族苦难时代年轻一辈的救国热情；也有写外国题材的，比如，刘盛亚（S. Y.）的《小母亲》写的是战时德国的生活，讽刺、暴露纳粹德国从精神、肉体上残害青年的罪行，揭露德国法西斯主义专制暴行。作家的视界比抗战前期更为广阔，观察也比抗战前期深刻，开始去描写战时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多是关心着民族的将来，关心着人民的幸福和痛苦，关心着青年一代的苦闷和磨折，关心着社会道德的堕落、风气的败坏等，表现的生活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因此这一时期中、长篇小说开始大量涌现，抗战小说创作出现多样发展的局面，不但实现了主题的多重性，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实现了多样化，艺术上则渐趋成熟，在大众化的文艺中追求个性化的艺术表达。

这一部分，首先，我们对这一时期小说反映的主要内容战时生活的如实展现进行论述。其次，我们分别从主题的多重性、人物形象的多样化与艺术表达的个性化三个方面论证抗战后期大后方小说走向多样化的文学特征。

通过以上对《抗战文艺》上的小说所进行地全面考察、分析，可以看出，抗战时期大后方小说明显地以1942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呈现出由单一向多样化发展的文学特征。

相关评论

评论人：111 评论时间：2010-1-11 0:00:00

111

发表评论：

昵称：

评论内容：

提交评论

重置

渝ICP备1019581号-2

Copyright©2011重庆沙磁文化促进会

技术支持：重庆图书馆网络数字中心